

# 张衡主要赋作系年

赵 坚

张衡，字平子。汉章帝建初三年（78）生。张衡淹通之才，文学、史学及自然科学上，他都有所建树，一生著述颇富。本文根据《后汉书·张衡列传》、《全后汉文》、《张河间集》以及《文选》、《古文苑》等有关材料，试图考订张衡主要赋作的系年。疏陋武断之处，识者正焉。

## 《南都赋》：

《六臣注文选》本篇李周翰题注云：“南都在南阳，光武旧里，以置都焉。桓帝时议欲废之，故衡作是赋，盛称此都是光武所起处，又有上代宗庙，以讽之。”同篇张铣注亦云：“‘桑梓’谓南都，言光武能行孝思旧，因谏桓帝何不往之意。言‘真人南巡’者，亦冀天子复南巡视见旧里邑也。”《张河间集》赋题注及李调元《赋话》卷七本条皆因循唐注的旧说，定此赋作于桓帝朝。

这是错的。案《后汉书·张衡列传》载“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永和四年为公元139年。而桓帝公元146—167年在位，其时衡死业已有年，是绝对不可能用赋谏诤废南都事的。

张衡籍贯南阳西鄂，和光武旧里蔡阳同郡。他举孝廉前曾做过郡太守鲍德的主簿。因此对南都的山川形势、往事旧闻非常熟悉。本赋之作，既衔同乡之荣，又逞掌故之熟。这是一。赋有“于是乎鲵齿眉寿鲐背之叟，皤皤然被黄发者，喟然相与歌曰：‘望翠华兮葳蕤，建太常兮绯绯，驷飞龙兮骙骙，振和鸾兮京师，揔万乘兮徘徊，按平路兮来归，岂不思天子南巡之辞者哉！’”《六臣注》刘良曰：“言老人思天子而作是歌。”吕延济也说：“南都老人若此，岂曰不思天子之歌辞哉？”案《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光武帝从建武十七年（41）夏四月起至十九年（43）秋九月曾多次南巡故乡，“修园庙，祠旧宅，观田庐，置酒作乐，赏赐。”荣耀旧里，盛况空前，赋中的老人一定亲眼见及。如果当时他们方届垂髫之年的话，那么至永元中当近古稀之年了。这是二。此外，从赋的体式规模及行文风格看，模拟司马相如、扬雄大赋痕迹历历可辨，创作上还显得不很成熟，达不到《二京赋》尤其是《东京赋》的思想深度，而呈现出一派蓬勃向上、歌舞升平的气象，无疑是早年之作。因此，笔者姑定其作于永元九年（97）左右，作者时为本郡属吏。

## 《两京赋》

《后汉书·张衡列传》谓：“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

“大将军邓骘奇其才，累召不应”。案邓骘拜大将军，在安帝永初元年（107），永初中邓

# 拜伦和雪莱

胡文华

拜伦和雪莱，这两颗十九世纪英国诗坛的巨星，在许多方面有着相同而又不同之处。如果把他们的异同进行一番比较研究，不无裨益。

拜伦和雪莱的最为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们都出身贵族而又彻底背叛了他们的阶级，成了高尔基所称的“资产阶级的‘浪子’”。他们都一贯赞扬法国大革命，同情工人运动，醉心于革命所广为传播的自由与平等的理想，认为它是人类历史上的光辉时期，而极其憎恨反动势力在革命失败以后的卷土重来，特别憎恶以梅特涅为首的镇压和奴役人民的神圣同盟。这在拜伦的《卢德派工人之歌》和长诗《哈罗尔德游记》以及《堂璜》有关章节中，都有所反映。而雪莱在《伊斯兰的叛变》、《写于卡色瑞统治时期》、《给英国人民的歌》、《自由颂》、《虐政的化装游行》等诗中也阐发了同样的精神。正是在这一重要问题上，他们跟消极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等分道扬镳，泾渭分明。因此，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文中说：“雪莱势焰方盛，‘累召’之事，当在其时，则《二京赋》传布京师，引起权贵注目，估计在永初初年。因此，笔者姑定其作于98?—107?。

## 《应间》

《后汉书·张衡列传》：“顺帝（126—144在位）初，再转，复为太史令。衡不慕当世，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自去史职，五载复还，乃设客问，作《应间》以见其志云。”

则其作于顺帝永建元年（126）。《应间》是张衡创作活动前后期的分水岭。他是从《应间》开始作品内容的突破和形式的探索的。如果说张衡前期赋作主要是面向外部大千世界，艺术手法上模拟正宗大赋以体物铺陈、夸张声貌为胜，并重在再现以及宣扬儒学的话，那么他从《应间》开始的后期赋作就转而遁入内心主观世界，接受屈骚影响以抒发感念、披露情绪见长，强调表现和在精神上的倾向道学了。

## 《思玄赋》

《后汉书·张衡列传》：“后迁侍中，帝引在帷幄，讽议左右。尝问衡天下所疾恶者，宦官惧其毁已，皆共目之，衡乃诡对而出。淹竖恐终为其患，遂共谗之。衡常思图身之事，以为吉凶倚伏，幽微难明，乃作《思玄赋》，以宣寄情志。”

《全后汉文》小传谓张衡“阳嘉（132—135）中迁侍中。”则其言事忤宦官意，遭谗受讥：“意不得志，欲游六合之外，”（《文选》李善注）当在阳嘉末年（125），赋即作于其时。

莱，天才的预言家雪莱和满腔热情的、辛辣讽刺社会的拜伦，在工人中间拥有最广大的读者。”

拜伦和雪莱成为“资产阶级的浪子”，这在他们读书时就已开始，他们都对学校中的不公正制度进行了斗争。拜伦于1801年在哈罗公学读书时，虽然只有十三岁，但已经敢于和那时学校中存在的“学仆制fagging system”（高年级生差遣、欺侮低年级生的制度）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雪莱于1804年进入伊顿公学时才十二岁，也对“学仆制”提出抗议，认为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暴虐行为必须受到谴责和制止。以后，雪莱进入牛津大学，不到半年就发表了小册子《无神论的必要》。这大大触怒了当权者的忌讳，因为，在一百多年前的英国，宗教势力非常强大，谁敢怀疑上帝，宣传无神论，就等于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因此，雪莱被学校开除出去。但是，雪莱没有低头，也决不肯修改他的无神论。

拜伦和雪莱在恋爱、婚姻方面也都受到过家庭的干涉和社会的迫害。英国反动势力利用他们在婚姻上的波折，散布种种谣言，简直把拜伦和雪莱说成恶魔再世。有些“旅行者”竟然寸步不离，尾随两位诗人，甚至有时站在高处，用望远镜窥探他们的活动。他们实在不堪其扰，只得离去。拜伦前往意大利参加了以反抗奥地利统治为宗旨的烧炭党活动，以后又转往希腊参加他们反抗土耳其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并在那里献出他宝贵的生命。雪莱也于1818年再次被迫离开祖国，客死他乡。拜伦和雪莱实质上都是从英国被放逐出去，英国统治阶级对这两位卓越的进步诗人所采取的迫害方式几乎如出一辙。

拜伦素以头角峥嵘、倜傥不群、傲视群伦著称，但自在瑞士日内瓦湖畔结识雪莱以后，有感于雪莱对自由与平等的理想和坚定的献身精神也不由得拳拳服膺，并虚心接受了雪莱的许多正确意见。例如雪莱看到法国大革命失败后，人们存在的失望情绪，就在1817年写了长诗《伊斯兰的叛变》（原名《莱翁和西斯娜》），号召人们坚定信心，继续前进。诗中的主人公莱翁和西斯娜为争取人民的幸福和正义，悲壮地牺牲了，但全诗浸透着无比的乐观精神，坚信人类最终会得到解放。诗人在首诗的序言里，实际上批判了拜伦的《东方故事》等早期创

### 《归田赋》：

《文选》李善注谓：“《归田赋》者，张衡仕不得志，欲归于田，因作此赋。”案张衡仕途淹滞，一生遭际，“仕不得志，”非一朝一时。《六臣注文选》李周翰注曰：“衡游京师，四十不仕。顺帝时阉官用事，欲归田里，故作是赋。”则坐实顺帝时作。笔者认为除“四十不仕”的说法不确切外，李说可从。《归田赋》和《思玄赋》语意殊近。几乎有复叠的地方。两赋相较，细绎文意，可以推断作于同一环境氛围及心理背景。如果说有区别的话，那只是《思玄赋》“忧愁幽思”更深沉些，屈骚的影响大些，而《归田赋》故作恬谈渊静，庄子的哲理气重些。也许忿激之余，无可奈何，只好归于寂谧了。至此，笔者姑定《归田赋》作于《思玄赋》同年（135）稍后。附带提及：《髑髅赋》的系年，文献不足征，难以按断，但估计作于《思玄》、《归田》同期，只是恬谈到完全倒向庄子之道，而成为一篇玄言赋了。

《归田赋》是张衡后期赋的代表作，标志着他的创作最后形成独特风格并臻于全面成熟。它在内容上言志抒情，在形式上扭转大赋铺陈排比和参差错落的散文化倾向，吸收了楚辞整饬的句式，而节奏更加顺畅，诗化倾向更加明显。这种抒情短赋的新体式，以后演变成为魏晋六朝抒情赋的主流，王粲《登楼》、向秀《思旧》、陆机《叹逝》、潘岳《闲居》、陶潜《归去来辞》等都是以之为祖模的。